

异文化书系

丛书主编◎叶 隼

GEDE SIXIANG
ZHI
XINGCHENG

歌德思想之形成

——经典文本体现的古典和谐

叶 隼◇著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异文化书系

丛书主编◎叶 隼

歌德思想形成

——经典文本体现的古典和谐

叶 隼◇著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歌德思想之形成——经典文本体现的古典和谐/叶隽著.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10

ISBN 978-7-5117-0580-8

I. ①歌…

II. ①叶…

III. ①歌德,J. W. V. (1749~1832)—思想评论

IV. ①K835.16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99498号

歌德思想之形成——经典文本体现的古典和谐

出版人 和 龔

责任编辑 邓 彤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36号(100032)

电 话 (010)66509360(总编室) (010)66509353(编辑室)
(010)66161011(团购部) (010)66130345(网络销售)
(010)66509364(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cctpbo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兴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960毫米 1/16

字 数 350千字

印 张 23.5

版 次 2010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 68.00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66509618

“异文化书系”总序

作为中国现代学术第二代人中的佼佼者，钱锺书先生、费孝通先生、季羨林先生三位学者，都曾对异文化问题表达过特别的洞见。以梵学为业的季羨林先生说了一句大白话：“从古代到现在，在世界上还找不出一一种文化是不受外来影响的”。作为一代文史大家的钱锺书先生则谓：“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而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晚年则以浩大的气魄展望全球化时代人类文明的远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若将三者合而为一，略作引申，则这种论述可谓层层递进，首先是承认异文化的极端重要性，因为只有在与异质性文化的不断碰撞中，才有自我的发展和演进；其次是东西文化的二元结构，即既存在一种东、西方文化之分的相辅相成、互补而生，同时更有人类文明发展的普适性原理；再次则指向人类文明的“天下大同”，这其中更进一步关涉到各种子文化如何去面对他者的原则性问题，其标的却是直指“天下”概念。可以认为，中国现代学人的这种“网链点续”性质的接力思考，展现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文化起点”与“思想高度”。应该承认，这种文化层面的“登高望远”与作为战略理念的“和谐世界”的目标提出，是有其共通之处的。而要想实现这样的理想，则以一种宏观大度的气魄审视人类文明史整体进程，无疑洵属必要。故此，在全球化趋势和现代性背景日益凸显的当代，作为崛起中国的知识阶层，我们不但要立定“求知识于世界”的雄心，同时要有“观大势于纸上”的能力，设若如此，怎样选择求知、致思和创新的策略与路径就显得至关重要。



不仅是“立言者贵在立异”，更是“求知者贵在习异”。在全球化、现代性、大国兴替的整体宏观格局下，东西方文化交流乃是一种具有基点意义的常态平衡格局。如果我们能站在这种宏观层面考察问题，则会清楚地看到，在现代世界的形成过程中，若干大国的兴起，其实与由一般意义交流史而衍生而出的文化与知识的“互动史”密切相关。这其中不仅有着文化—经济—政治层面环环相扣、密切关联的一面，也有着对异文化主要国别的资鉴背景，后者有时甚至“举足轻重”。对这一点，第一流的知识精英均有极清醒的意识，如歌德总结的很清楚：“我们不应该认为中国人或塞尔维亚人、卡尔德隆或尼伯龙根就可以作为模范。如果需要模范，我们就要经常回到古希腊人那里去找，他们的作品所描绘的总是美好的人。对其它一切文学我们都应只用历史眼光去看。碰到好的作品，只要它还有可取之处，就把它吸收过来。”此处涉及到文化交流的规律性问题，即如何突出作为接受主体的主动选择性，若按陈寅恪所言：“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这不仅是中国精英对待外来文化与传统资源的态度，推而广之，对各国择取与创造本民族之精神文化，皆有普遍参照意义。

自16世纪之西学东渐大潮以来，对西方文化的输入已然是蔚为潮流，但我们对自身归属的东方范围内的其它异质文化之资鉴则相形见绌。故此，我们一方面固然要做“拾遗补缺”的西学译介工作，同时尤其需要将眼光投射到“主体生成”性质的东学建构方面。更进一步说，异文化之间的关系发生史及其提供的有益经验与规律总结，则更为我们所特别关注。

在中国现代学术的构建期，本国学者在以中国为主的“中外交流”层面已经多有贡献，诸如方重《18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范存忠《中国文化在英国：从威廉·坦普尔到奥列佛·哥尔斯密斯》、陈受颐《18世纪英国文化中的中国影响》、钱锺书《17、18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陈铨《德国文学中的中国纯文学》等都堪称佳作，



这也足以证明中国文明在吸纳着外国文明的同时，也始终在反哺于外国文明，不过有时强烈，有时低调而已。而近三十年来，在中西文化交流史领域更是新作迭出，领域、范围和层次都可谓颇有提升。但对这方面的深度研究和致思发明，仍有待来者。而撇开我们擅长的这一领域不谈，就纯以外族（国）为中心的文化关系史来看，其实我们也不乏这方面的资料。就以译成中文的为例，无论是大师自己的异国感受，如欧文的《见闻札记》，显现的是“美国文学之父眼中的19世纪欧洲”；还是学者的视域，如布鲁玛的《伏尔泰的椰子》，关注的是“欧洲的英国文化热”。至于将东西文化放入视域的，则三好江夫讨论《日美文化冲突》相当经典；涉猎面更宽的，如基尔南的《人类的主人》，考察的是“欧洲帝国时期对其他文化的态度”；而更高层面的，如中村元的《比较思想论》，则在更为宏观的视域里对东西方文化“别共殊”。这些比较文化史著作，虽多与中国文化无直接关系，但对我们理解世界文明进程中的“互动史”因素，却极为重要。故此本丛书拟突出这一互动视角，一方面译介和引荐知识界虽然陌生，但久感兴趣乃至期待的相关命题，譬如19世纪美国人留学德国、20世纪德国知识精英流亡美国、近代日本的留学史和发达史、13世纪阿拉伯文化对西欧复兴的影响、乃至亚欧文明间的整体互动等；而在关于中国和外国互动史中，我们一方面强调互动视角，另一方面则希望提倡个案研究与宏观叙事相结合的兼容维度，进一步在深度上推动此领域的研究。当然，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必须沉入大量的、具体的乃至极细微的史实考证中去，通过对具体个案研究、群体研究，来建构起丰富而多元的文化、学术、知识等的“互动史”景观。

正是从以上强烈的问题意识出发，我们所推出的“异文化书系”，既要充分引进为此前学界相对忽视的外国学术成果，同时也要促进本国专家学者在新领域的开辟性研究。相比较已经汗牛充栋、引自西方乃至外邦的文化资源，本丛书更关注在一个整体性的“异文化范畴”中来把握中国与东方的概念形成。在人类文明的整体演进过程中，异文化间的交流始终是文明进程的推动器。文化影响与吸收乃是具体的国族文化不断提升自我、进行创造性提升和强势转化的枢纽环节。故



此本丛书以异文化为张力、以互动史为枢纽、以侨易学为视域，努力呈现人类文明发展史过程中的“动力图景”。本丛书特别强调“互动”的概念，即经由交流之后而产生的接受与影响过程，最终导致了各自学术/文化传统的主体性发展的飞跃性提升。归纳之则为：交流是入口、接受是枢纽、互动是潮流。当然，无论是接受还是影响，其本身又是非常复杂的，这牵涉到客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时代和语境之间的关系、求是与致用之间的关系等等。但最终仍应归结为互动，即各自主体本身的自我发展问题。无论传播者与接受者的主观意图如何，任何一种发展都不可能是单向的。

总之，如何充分借鉴东、西方学术文化资源，如何利用人类文明的历史财富，以为中国当下的学术文化建设提供全新的视角和有益的镜鉴，为东方的现代性独立提供有利的文化资源，这是本套书系尝试达到的目标。希望能集学界同仁之力，持之以恒，水滴石穿，经一定时间之积累而成为一座裨益各界、略富新意的“异文化资源库”。

叶隽

2010年8月22日于北京酷暑

序：歌德研究也得不断创新

范大灿

1986年冯至先生的《论歌德》一书出版，全书分为上下卷，上卷是1941年到1947年写的文章，下卷是1978年以后写的文章。这部书有一篇代序，题目是《论歌德的回顾，说明和补充》。在这篇代序中冯先生强调，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他的思想有了不少变化，对歌德的认识也与以前有所不同，因而他对歌德的研究可以分为“前期”和“后期”。冯先生认为，在前期，也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前，他发表的文章（这些文章于1948年汇集成一本书，题为《歌德论述》）触及到了歌德思想中重要的几点：蜕变论，反否定精神，向外而又向内的生活。“但是”，他特别强调，“还有更重要的方面没有触及到。”那么，什么重要的方面没有触及到呢？他是这样回答的：“那时我从歌德的作品中领悟到一些生活的智慧，钦佩他对于人生和自然有透彻的观察和理解，写出了那么多优秀的诗和伟大著作，认为他是一个‘无可訾议的人’，而没有把他看做与他的时代不可分割的‘社会的人’。”这就是说，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冯先生把歌德看做是伟大的思想家，领悟他的生活智慧，发掘他对人生和自然的精细观察和深刻认识；同时也把歌德看作是伟大的作家，揣摩他作品中无穷美妙的意境。新中国成立以后，他认识到，自己以前的这些看法存在一个重大“缺陷”，即没有把歌德看做一个“与他的时代不可分割的社会的人”。

是什么使冯至先生认识到他前期对歌德的研究中存在如此重大的缺陷呢？是恩格斯批评格吕恩《从人的观点论歌德》一文。据他在



《论歌德》一书的代序中讲述，1948年北京解放前夕，他读到恩格斯这篇文章。恩格斯的批评主要是针对格吕恩所宣扬的“真正社会主义”，但冯先生发现，其中有一段话对歌德做了“精辟的分析”。这段话是：“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有时是叛逆的，爱嘲笑的，鄙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则是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的庸人。连歌德也无法战胜德国的鄙俗气；相反，倒是鄙俗气战胜了他，鄙俗气对最伟大的德国人所取得的这个胜利，充分说明‘从内部’战胜鄙俗气是根本不可能的。”冯先生在引了恩格斯的这段话之后写道：“我读了恩格斯这段话，反复思索，过去我虽然从歌德那里得到不少教益，但对于歌德之所以成为歌德还是知之甚微。”

可以这样说，冯至先生完全接受了恩格斯的观点，并且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始终不变地按照恩格斯制定的歌德“既伟大”又“渺小”，既是“天才”又是“庸人”的框架来研究歌德的。他还特别指出，“只强调歌德的积极方面，不谈他的消极方面，这不符合恩格斯的精辟分析。”所以，在冯先生的所谓他研究歌德的“后期”，即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歌德在冯先生的笔下始终是这样的：作为伟大作家和思想家，“他气势磅礴，包罗万象，好像咀嚼了全世界文化的精华，敢于向与莱布尼茨同时代的科学泰斗牛顿挑战（虽然他的颜色学理论是错误的），钦佩富于反抗精神的拜伦，自认为从英国的戏剧家兼诗人莎士比亚，荷兰的哲学家斯宾诺莎，瑞典的自然科学家林奈得到无限的教益；他旅行瑞士和意大利，称赞新建立的美利坚合众国，神游波斯，阿拉伯的原野，对远方的中国也有一定的理解。他永无厌倦地在精神世界里翱翔，创作出许多名篇巨著，这些功绩在人类历史上是不能泯灭的”。在充分肯定了歌德是位伟大作家和伟大思想家之后，冯先生在这篇代序中又紧接着指出歌德庸俗的一面：“他的这些奋斗和努力并不影响他的平静而有秩序的生活，也无伤于他周围带有鄙俗气的环境。”这就是说，歌德的“庸俗”和“渺小”表现在，他的这些奋斗和努力是在“平静而有秩序的生活”中进行的，并不触及“他周围带有鄙俗气的环境”。冯先生还指出，歌德“视秩序为生活，对群众运动有本能的憎恶”，他希望在平静中生活，



反对革命。另外，“他在魏玛公国担任各种行政工作，小心谨慎，对王公大人毕恭毕敬”。总之，“歌德在精神世界里所想的，所创造的是那样博大，而在现实生活中又显得那样渺小”。

冯至先生对歌德的这种评价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学者对歌德评价的基本模式。人们在谈及歌德的伟大时总强调一下他如何“庸俗”和“渺小”。所谓“庸俗”就是指他如何远离革命洪流，甚至反对革命；他如何反对革命暴力，敌视群众运动。所谓“渺小”就是指他不仅在宫廷供职，而且在王公面前奴颜婢膝。其实，歌德只是一个文学家，思想家，他不是一个革命家，用革命者的标准去衡量一个醉心于文学创作和潜心挖掘人生意义，自然奥妙以及人与社会和的关系的作家和思想家是合适的，更不能由此得出“庸俗”之类的结论。另外，也不能说，一个作家，一个思想家对王公及其代表的制度只能采取批判的态度，如若不然，那就是“渺小”。

恩格斯作为一个革命家，从革命的立场出发，为了革命的目的，有权对歌德做出他认为合理的评价，但这种评价不应该成为以追求客观真理为目标的学术研究的指导。1949年以来，我国的歌德研究基本上是在恩格斯的那段语录的指导下进行的，我们的歌德研究要想进一步发展就必须突破这个框框。近年来，很多人尝试从新的角度研究歌德，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叶隽写的《古典和谐与东西衔接——经典文本体现的歌德思想之形成》，就是很值得重视的一部学术专著。

叶隽在《绪论》中斩钉截铁地说，“歌德的意义，仅从文学史的角度是谈不清楚的。”为了真正了解歌德的意义，他“愿意用一种以文化社会学理论为主的模型来考察他，将其置于文学史，文化史，思想史和社会史的综合视野中，力图展现一个完整而真实的歌德”。虽然叶隽谦虚地说，限于学力，他还无法完全按照这个模型研究歌德，但他在这部著作中已经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叶隽认为，“在德国思想史上，一直有两条线索，一是逻各斯路径的启蒙、理性、科学等；另一条则是由秘索思路径而来的‘浪漫情径’，到后来则表现为反启蒙的非理性（感性）、反科学与癫狂。”把“秘索思－逻各斯”二元结构引入到思想史领域，秘索思就演化成



“保守主义”，而逻各斯就演化成“自由主义”。自由主义者多为思想家，他们在书斋里冥思苦想，在文化领域大显身手，而保守主义者则在现实政治领域引导风潮，在那里占据优势。歌德虽然在狂飙突进时期一度倾向于由秘索思路径而来的“浪漫情径”，但他很快就又回到“启蒙－逻各斯路径”。所以，歌德基本属于那种在书斋里冥思苦想的思想家，他虽然也参与实际工作，如到各地旅行考察，研究自然现象，指导开矿修路，等等，但他不直接参与社会政治斗争。他在文化领域大显身手，但在社会政治领域却不是引领潮流的先锋战士。叶隼认为，“正是从这样一种特殊的视角切入歌德研究，我们才会揭出歌德在更广泛领域中的意义。”

由此，叶隼得出的最主要的结论是：“歌德的思想或许代表了人类现代文明的一个尚无法攀越的高峰。”为了证明这一结论，他首先将歌德的一大批有影响的著名作品进行了细致的剖析，将文本阐释作为最根本的研究策略，但又没有陷入就文本论文本的狭隘思维中，他在探讨一部作品时都要把它与同时代相类似的作品放在一起，对它们进行综合考察。也就是说，他是在一个广阔的德国历史的语境中考察一部作品，这样就能清楚看到，这部作品在德国文化史中，在德国思想史和文学史中的意义和地位。

叶隼的这部著作有许多大胆的论断，人们也许会对其中某些论断提出质疑，但学术研究的价值在于创新。恪守前人的——哪怕是伟人的结论，都无助于学术研究向前发展，学术研究本身就要求研究者敢于提出大胆的论断，敢于在争论中探求真理。从这个角度看，叶隼这部著作的最大特点，就是它采用国内歌德研究者还很少采用的方法去研究歌德，提出了一些新颖的观点。

愿我们的歌德研究不断创新。

目 录

序：歌德研究也得不断创新（范大灿）	1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节 歌德的意义：文学史/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诸种 视野的交融	2
第二节 中国的歌德译介与研究现状综述——兼及西方的歌德 研究	5
第三节 歌德思想的“精神三变”与“婴儿蜕皮” 之过程	13
第二章 冲创之力——狂飙时代的歌德思想	19
第一节 贵族—市民与骑士—农民的阶层博弈与群体互动 ——“宗教改革”背景中的《铁手骑士葛兹》 及其思想史意义	19
第二节 救世理想与现世艰难——《普罗米修斯》断片中的 “宿命叛逆”现象及其思想史元素	35
第三节 “青春迷惘”与“制度捆绑”——《少年维特之烦恼》 爱情悲剧后的惘失之痛：以《少年维特之欢乐》 为参照	53



第三章 生命之思——复归启蒙的歌德思想	71
第一节 禽兽世界的人类寓言——《列那狐》的玄机	71
第二节 “一体二魂”所反映的二元论问题——《浮士德》 的理性路径与歌德思想的自我矛盾	88
第三节 第三节 逝去未尽英雄志——《埃格蒙特》与 《洪堡王子》比较研究	116
第四章 情爱之难：悲剧之宿命——歌德的情爱观	138
第一节 女性圣洁之美与托阿斯的刻骨之爱—— 《伊菲洁莉在陶里斯岛》所反映的美之追寻	138
第二节 尊严、爱情或生命本色——《托夸多·塔索》 中的诗人天问	156
第三节 婚姻制度与爱情之维——从《齐本克思》到 《亲合力》：传统与现代之间的“逐新之爱”	177
第五章 理想社会——古典和谐的歌德思想	193
第一节 同是漫游人——《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 与《弗朗茨·斯泰恩巴德的漫游》中反映的思想路径	193
第二节 “市民生活”与“生命意义”——《赫尔曼和多罗泰》 中表现的通向德国人的宁静家园之路	209
第六章 世界公民——东西大同的歌德思想	227
第一节 耄耋老翁思何方——作为思想史文本的文化诗集 《西东合集》与《中德杂咏》	227
第二节 “古典和谐思想”的更高阶段—— 在《希腊隐者许佩里翁》烛照下的《威廉·麦斯特的漫 游时代》	246



第七章 结 论	264
第一节 真正的人与虚幻的神——“孔子诗思” 烛照下的歌德泛神论	264
第二节 诗之变形——论歌德艺术创造的进步	277
第三节 思之和合——论歌德思维模式的拓新	290
第四节 忧患云海诗哲心——现代性视域中歌德思想 形成史的意义	308
歌德年表简表	328
主要参考文献	332
西文－中文名词对照表·索引	348
后 记	359

第一章 绪 论

如果说研究席勒，因为前期的工作很少，还能算是在汉语学术语境中有所突破的话，那么再转过来研究歌德，却是“崔颢题诗在上头”了。且不说新时期以来多位学者涉猎歌德^①，就是中国德语文学学科的构建者们，也多半是以对歌德的研究而起家的。尽管如此，我仍然决心要“触摸”歌德，之所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大致有以下几点考虑：一是研究德国，不深入接触和理解歌德，很难对德国思想与文化体贴入微，更不用说是治德国文学了；二是虽然我更对席勒有一种精神上的亲近与共鸣，但我对歌德仍抱有批评的敬意，愿意更深入地去接触与理解这个生命个体，而两者相交甚笃的事实，亦足以证明歌德值得关注；三是虽然国际上（首先是德国自身）的歌德研究已汗牛充栋，但我仍认为借助新生的理论范式，有可能“读古典而出新意”，这一研究论题的选择正是主要出于这样的思路；四是就汉语德国文学学术史而言，前贤在歌德论题上的积累最多，所以也最有可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将此研究再往前推进一步，为中国本身的学术文化思想建设提供更多的借鉴资源。

^① 就汉语语境而言，1978年以来，最主要的歌德研究者自然仍属杨武能教授，除了大量的译介作品之外，他的如下论著可以参考。杨武能：《歌德与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杨武能：《走近歌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Yang, Wuneng: *Goethe in China (1889 - 1999)*. Frankfurt am Main, Berlin, Bern, Bruxelles, New York, Oxford & Wien: Peter Lang GmbH Europäischer Verlag der Wissenschaften, 2000. 此外，值得提及的还有余匡复、高中甫、王炳钧等，在下面章节有较详细论述。



第一节 歌德的意义：文学史/思想史、 文化史/社会史诸种视野的交融

论德国则必以“歌德”，歌德在德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毋庸赘言，“巍巍乎高哉”。不止一位学者，将歌德比作孔子，来说明其在德邦的“高山仰止”。

我对歌德的态度，大体是尊重其文学创造的价值和意义，对其生命选择与立世态度尽可能抱“理解之体谅”，但却不谈“温情”，不论“体贴”，那都留给席勒了。原因嘛，也很简单，歌德一生，衣食无忧、位高爵显，缺乏一种生命的“奋斗之勇”与“冲创之力”。当然，这也正是歌德之为歌德的原因，他在最平静风顺的环境中却能生产出最为杰出的文学作品，这也是一种了不起的境界。不过，这种境界，只能唤起我遥远的敬意，却难生出“同呼吸共命运”的“高山仰止”之情。

如果说席勒与歌德都体现了德国思想中“诗化哲学”的因子，那么席勒是具有撼人心魄的“史诗”之力，而歌德体现的则是平淡无华的“抒情”之美。两者取向不一，却并不妨碍他们成为至交好友，并相互激励、生发灵感，不但建构出伟大人物友谊的典范，更创造了德国文学史上最辉煌的创造年代。其实，对于歌德来说，这同样也是一次生命中不可复制的特殊经历，日后他更有着许多的“文化记忆”（Kulturgedächtnis）。

歌德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无人能及，不仅是在德国文学史上，即便放入世界文学的宏观视野中，他也是那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之一，其谱系可自荷马算起，但丁、莎士比亚、巴尔扎克、雨果、托尔斯泰等均可列入其中^①。但就作品之博大且兼宏富而言，恐怕只能列入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与歌德、雨果。可歌德的意义，仅从文学史的角度是谈不清楚的。

在我看来，与其说歌德是“文学奥林匹斯山上伟大的宙斯”，不如

^① 关于这个问题，可参见【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江宁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但此君将荷马排除在外，径直从但丁算起。



将其还原为“现实生活中完整而真实的人的形象”。所以愿意用一种以“文化社会学”理论为主的模型来考察他，将其置于文学史、文化史、思想史与社会史的综合视野中，力图展现一个完整而真实的歌德形象。不过，限于学力，那还是下一步的计划，此处还是使用一种“笨办法”，即通过经典文本的选择性精读，以求达到“触摸前贤”的目的。

歌德浮现于德意志大幕的时代，是从“狂飙突进”开始的，但“狂飙突进”只是18世纪德国启蒙运动中的一个小插曲而已，虽然它也反映出这个时代另一支非常重要的潜流之声，但并不能压过启蒙的主旋律。其实，在德国思想史上，一直有两条线索，一是逻各斯路径的启蒙、理性、科学等；另一条则是由秘索思路径而来的“浪漫情径”，到后来则表现为反启蒙的非理性（感性）、反科学与癫狂。前者以康德、莱辛、温克尔曼等为代表，后者则以哈曼、赫尔德等为旗手。歌德、席勒等人，正处于两种强大的思想压力之间。而歌德与赫尔德的结交与来往，正为他走向后者提供了动力因素。如果说“狂飙突进”反映了那代人凭借着一种青年凌厉锐气，张扬感性大旗的“浪漫”表现的话，那么可以说歌德很快地就摆脱了这个阵营，而走向了另一端；席勒虽然是后来者，但似乎不久也明白了其中的可能陷阱，而转身他向，其行进甚至更加极端，一头栽进康德哲学的理性路径中去。“狂飙突进”虽然因符合了社会上的时代潮流，而博得一时的众多喝彩，但就其本质来说，并不成气候。

而如果将此种“秘索思－逻各斯”二元对立结构引入到更为宽泛的思想史（兼及政治社会史范畴）领域^①，那么“保守主义”的概念或许更适合前者，而“启蒙运动”在19世纪的继续发展，则为“自由主义”。相比较思想家在书斋中的“冥思苦想”，那么实践者在现实政治社会领域中的“挥斥风云”则无疑更具引领风潮的意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的二元对立，正不妨视作“秘索思－逻各斯”思维方式的 思想史具体表现；相比较启蒙思想家们（可视作自由主义者）在文化场域中的大展身手，保守主义者无疑在政治场域中更占得优势。正是从这样一种特殊的视角切入歌德研究，我们会揭出歌德在更广泛社

^① 关于“秘索思－逻各斯”概念模式的提出（所谓“M-L”模式），参见陈中梅：《柏拉图诗学和艺术思想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